

雨果与沈宝基的诗歌创作

梁海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摘要: 以沈宝基的《雨果的哀史》《毛驴的代言人》《诗人的人性与神性》为个案, 阐述了沈宝基诗学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与雨果的文艺理论思想的渊源。《雨果的哀史》是《悲惨世界》的微型翻版, 《毛驴的代言人》评述了雨果的文艺创作原则, 《诗人的人性与神性》则可看作是雨果式的浪漫主义宣言。

关键词: 雨果; 沈宝基; 诗学; 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222-05

“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半期盛行于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 浪漫主义作家常借助热情奔放的语言、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等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大事是1827年雨果发表的《克伦威尔序言》。《序言》猛烈抨击了古典主义的戏剧创作原则“三一律”, 全面提出浪漫主义文学的纲领, 并从美学观点论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认为艺术的主旨应该是再现事物之间的对比关系, 这就是“美丑”对照原则。1830年以后的浪漫主义被后人称之为后期浪漫主义, 其主导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代表作家作品有雨果的《惩罚集》《观照集》和《凶年集》等诗集以及小说《悲惨世界》等。这些作品关注的角度从“个人问题”转入“社会问题”, 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上的种种矛盾。

沈宝基(1908~2002)出身于旧式知识分子家庭, 成长于内外兼修的治学传统时代。沈宝基对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作品的翻译始于1935年, 译诗《雨果诗选》和评述《可怜人研究》以及资料汇编《雨果学书目抄》刊于《中法大学月刊》第2期。《雨果诗选》包括雨果的《希腊的童子》(1828)、《出神》(1828)、《孩子》(1830)、《洋海之夜》(1839)、《干面包》(1877)等11首诗歌; 1952年, 译诗《雨果诗钞(7首)》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4期; 1959年, 译著《葛洛特·格》(雨果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3年, 译著《雨果传》(Maurois著)(与筱明、廖星桥合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 译著《雨果诗选》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译著《雨果抒情诗选(123

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 译著《雨果抒情散文选》(余协斌编选、沈宝基等译)和《悲惨世界的画师》(Maurois著、沈宝基等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4年译诗《歌》被飞白主编、胡小跃编的《世界诗库第3卷: 法国·荷兰·比利时》收录, 花城出版社出版; 1995年, 译诗《一切都离去了》被邹荻帆编选的《世界抒情诗精品》收录,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雨果的哀史》

雨果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 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不同的是, 他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是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 “诗人的两只眼睛, 一只看人类, 一只看自然, 前者叫观察, 后者叫想象”。^{[1](186)}雨果认为作家应该具备两大条件: “一个反映镜, 就是观察, 还有一个蓄存器, 这便是热情”, “真实之中有伟大, 伟大之中有真实”才是“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2](10)}《悲惨世界》既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又有生动的现实主义描写, 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在沈宝基的诗歌创作生涯中, 雨果的文艺理论思想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渗入其中。1943年北京《中国文艺》第9卷第3期刊发了沈宝基的诗歌《雨果的哀史》,^{[3](77)}该诗可谓是《悲惨世界》的微型翻版, 沈宝基在诗中“思索着雨果式的关于‘良知’‘罪与罚’‘地狱’‘灵魂’等母题”, ^{[3](20)}“一块面包/终生不赦的

收稿日期: 2012-01-13; 修回日期: 2012-06-19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09BZW05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法国文学对沈宝基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1011323B)

作者简介: 梁海军(1976-), 女, 湖南常德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罪”。^{[3](76)}《悲惨世界》的小说主人公冉阿让本来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工人，但失业和家庭负担逼迫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徒刑；又因他不堪忍受狱中之苦四次逃跑，刑期加到十九年。“若说是良心的追逼吧/心已在波涛中/洗成洋海色”。^{[3](76)}在冉阿让的头上，“层层叠叠地有一堆大得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堆积如山，直到望不见的高度，崇危峻险，令人心悸”。^{[2](26)}“谁是恶的种子呢/大家都是无辜的/男盗女娼是随便说的吗”。^{[3](76)}《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原来天真纯洁的少女，有自食其力、勤劳节俭的决心，但恶浊的社会玷污她，损害她，如包工头压低她的工资，债主对她进行盘剥，她把自己的头发和牙齿出卖后仍然走投无路，最后被迫为娼。沈宝基像雨果一样愤慨地提出责问，“谁是恶的种子呢”，以此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起诉和抗议。“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雨果的回答是“社会造成了一个奴隶即一个娼妓”。^{[2](25)}资本主义社会是真正的罪恶之源。“满怀愤恨一旦化为仁慈/祝福了/可怜的人不幸的孩子/烛台上发钟声的太阳/照亮了昔日的夜/即便此后/没有日月的时候/(且莫问有过几次微笑)/依然稳步地走着”。^{[3](76)}冉阿让出到社会后，饱受人们的歧视。当他想报复社会时，卞福汝主教的仁慈感化了他，在冉阿让偷了他家最宝贵的银烛台，被抓获后，他仍能很宽容地原谅冉阿让，劝他做个正直的人，并把银烛台送给了他，让冉阿让重新拾起自信，勇敢地面对现实。后来变得富有的冉阿让为那些被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和损害的贫苦者做了大量好事，如收养孤女珂赛特，然而他不断受到法律追捕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残酷和荒谬的本质。

“依然稳步地走着/甚至走入地底/但这里不是没有出口的地狱/因为从此他不走地狱的路了/因为像人类肠子的暗沟尽头处/是悠流的清清之水”。^{[3](76-77)}冉阿让后来尽全力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以此弥补自己从前所犯下的罪。但是人们知道他从前是个苦役犯后，都不接受他的好意，把他还是视为十恶不赦的坏人，连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孤女也误解他。可是冉阿让并不介意，仍然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是清清之水的悠流/而悠流的清清之水中/一个终于感悟了的仇人/(愿天下仇人都成了朋友)以自我生命的牺牲/换取拯救他生命者的自由的生命”。^{[3](77)}在《悲惨世界》中沙威是令人憎恶的法律的化身，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冷酷和残暴，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鹰犬，象幽灵一样紧紧追随着冉阿让。然而在沙威被起义者抓获后，冉阿让不计个人恩怨，私自将这个一直在追捕自己的仇敌放走。当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地下水道把马吕

斯救出时，在出口处，遇上了守候在这里的沙威。冉阿让请求沙威等自己送马吕斯回家后再逮捕自己，沙威被冉阿让多年行善、舍己救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他的信念动摇了。在放走冉阿让之后，沙威投河自尽了。“一颗终于感恩的灵魂/激起每一个人的浪波/在每一个如水的年代中”。^{[3](77)}《悲惨世界》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它登上了艺术的高峰，正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所著《雨果传》中写道：“岁月流逝。时光淹没了山坡和丘陵，但淹没不了顶峰。遗忘的海洋淹没了19世纪的无数作品，在这个海洋之上，惟有维克多·雨果这个群岛傲然屹立，岛屿的顶峰环绕着众多光辉形象。”^{[4](1)}

二、《毛驴的代言人》

沈宝基在1992年春节期间写了《毛驴》组诗，该诗由十二节小诗组成，其中第十节以雨果为写作对象，把雨果称为“毛驴的代言人”，“还有一位以蠢驴自居/替它说话”。^{[5](173)}作者在诗后加注说这里的“蠢驴”喻指雨果。^{[5](177)}《毛驴的代言人》中讲了一个毛驴的故事来宣扬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为人一世要懂得微笑希望/心地要纯真善良/他讲了一个故事/无穷感慨意味深长/有只毛驴把车拉/在沉重的筐子下/狠毒的鞭打下/筋疲力尽还是一声不响/拉着车儿急走前往/不停地前往/路上恰好有只蛤蟆/被顽童用石子击伤/疲乏不堪的毛驴连忙躲开/避免踩在/受了重伤的蛤蟆身上/诗人见了不禁长叹/傻子的善良/可敬的傻子的善良心肠... ...^{[5](174-175)}

雨果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人道主义是雨果的理想和情感的内核，这种思想贯穿他创作的始终。雨果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儿童、女性、弱者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其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只有仁慈、博爱才能拯救社会”。他宣扬仁爱、感化，确信爱、善良和仁慈是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善最后必将战胜恶而挽救人类。如《悲惨世界》通过描绘出许多不幸者的悲惨命运来表现“社会是真正的罪人”的主题思想。在这里，“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得十分充分。“一想到不再有人信奉，思想便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用一块块石头重建这两根神圣的支柱：尊敬老人，爱抚儿童。”^{[1](190)}他揭露对劳动者的压迫，反对个人集权，站在普通百姓和被压迫民族一边。雨果作品通过对劳动人民不幸生活的形象描绘，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起诉和抗议。如《巴黎圣母院》揭露了15世纪末法国上层社会和宗教的虚伪残暴，对生活

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善良和正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毛驴的代言人》还借毛驴的嘴控诉了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主义,认为它“貌似进步的/倒退落伍/学究气十足的渊博/实质是幼稚可笑的谬误/是伪宗教伪学术/为暴政服务的精神堕落”。^{[5](173)}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雨果的人生观、哲学观的发生了重大变化,脱离了保王党人的政治立场,雨果的创作也较为注重作品的进步政治性。“要是激进党人就是典范,是的,我就是激进党人。”^{[6](13)}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马反动政变,将共和国改为帝制,雨果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的立场,参加了反政变的斗争,失败后流亡国外达十九年之久。流亡期间,雨果创作了一系列进步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国内暴力与强权横行,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群众流离失所,遭受着巨大的苦难,这一切使雨果深刻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拯救国家,才能拯救人民。“是的,一个接受贫困的社会……是的,一个接受战争的人类,我认为是个低劣的社会,是个低劣的人类,我以在它之上的社会,在它之上的人类为目标,即一个无君主的社会,一个不分疆界的人类。”^{[6](13)}“一个无君主的社会”是雨果人生追求的目标。雨果在作品中把封建专制制度描写为造成这些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或痛苦不幸的根由,以此说明封建专制是人类遭受苦难的祸根。^{[2](11)}

同样,青年沈宝基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硝烟弥漫的动荡时代。1937年,沈宝基任职的北平中法大学因“七七事变”一部分搬到了南方的昆明,沈宝基依旧留在沦陷区,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控诉着侵略者的罪行。《沦陷后》一诗写于此时。“黑得真理/真理的黑/河山依旧/啊依旧的河山。”^①这首诗很短,一共才18个字,而且重复倒置,表达了沦陷后爱国者的浩叹。

“艺术是为己的,尤其是诗。为己者,自存也;自存者,永存也;永存者,为人也;故艺术中的为己,甚至高至远的目标仍是为人。”^{[7](69)}《小草》一诗将人民群众比作小草:“小草长在卑微的土上/崇高的山上/小草上在腐烂的尸上/活人的心上/小草是无处不长的/绿遍了人间天上。”^①“卑微的土”暗指小草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小草生命力是顽强的,不管平地高山、环境恶劣,它的地域是无限广阔的。小草就是普天下人民大众的形象。在这里,诗人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利手段,把革命的人民视为革命进步事业的基础,视为代表着未来的社会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必要性,是沈宝基的爱的理

想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超越,是沈宝基诗歌的进步性之所在。在《哭城》《塔下的呻吟》《哭坟》《鹊桥》(四首诗合称为《四个永恒的女性》)中,沈宝基更是高举反封建专制的旗帜,把封建专制作为一种残暴黑暗的力量与诗中主人公对立起来:“万里的寻找/徒然见此万里墙高吗/帝皇事业留传千古/况更有来者的崇敬与仰慕/呜呼累世剥夺的自由与幸福/堆成齐天之胜利的枯骨。”^{[5](21)}诗中累世齐天之“枯骨”与留传千古的“万里墙高”形成鲜明的视觉对比,身份卑微、弱小的孟姜女与高高在上的“帝皇”之间的尖锐矛盾实际上代表了劳苦大众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唯有革命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才能获得新生。“莫道我手指无力/莫道我呼声微弱/爱的手指与呼声/能摇震山川/我要一天天/我要一年年/搬下一块块巨大的砖/拆除了/东方之暴君的伟绩。”^{[5](24-25)}

“高谈阔论能解决什么/给人类带来什么幸福/这样的学派/如何对待人生与自然/学校里的学究是些捕鸟者/如何对待游戏与幻想/扼杀了孩子的天真烂漫/剪掉了童年的翅膀。”^{[5](174)}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强调文艺的美感教育,“诗人担负着灵魂的责任”,诗人应该为真理所引导,给予读者以有益的道德教训,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雨果在1840年出版的《光影集》中的首篇《诗人的职责》中写道:“诗人当此衰渎的时光/来为美好的岁月铺路/诗人对于乌托邦向往/脚站在此地,眼望别处/诗人应该和先知相仿/任何时代,在人人头上/用他的手,把一切主宰/不问对他颂扬或辱骂/如他手中挥舞的火把/把未来点亮,大放光彩!”^{[8](236)}

《毛驴的代言人》阐述了雨果基本的文艺理论创作思想:人道主义是基础,现实主义是过程,浪漫主义是目标。人道主义在雨果作品中体现为“博爱”与“良心”。“任何东西都不能制服人的良心,因为人的良心,就是上帝的思想”,^{[1](230)}现实主义的实质为“自然”与“人生”。“我们的灵魂象远离真实事物/和欢笑世界的,拿着灯火寻找什么/缓步地从黑暗的楼梯上/一直来到沉痛的内心深处。”^{[1](221)}浪漫主义体现为“进步”与“自由”,“它将永远在形成中,永远不会臻于完成”^{[9](321)}。雨果曾这样说过:“这些主题各有不同的诗,都是受同一个思想所感应的,它们之间没有别的联系,只有一条共同的线索,人类迷离中那条伟大而奇妙的线索,即进步”^{[2](18)}。“当时虽然他思想保守,但他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他要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走向善和美……他常是一个,但心中常想到别人,想到穷苦的人,不幸的人。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诗人。”^{[10](1-2)}

三、《诗人的人性与神性》

沈宝基在《诗人的人性与神性》中写道：“你必须要有人性/人性与神性/人性——并不流于/七情六欲的凡俗/神性——并不散布/虚无缥缈的预言。”^{[5](129)}这里的“人性”和“神性”具有独特的涵义。“人性”指人的社会生活，实质为浪漫主义者提倡的“自然”，既包括混乱喧嚣的人类社会，也涵盖粗狂蛮野的自然世界。

“自然”实则现实，为真实。浪漫主义文学通过对“自然”的描绘来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由于人既不是纯粹的精神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因而个体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方能获得自身自然发展的机会。人与自然和谐圆融为一体构成无限玄虚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才唯一具有沈宝基诗学中的真实的“美”。“诗自有其至真的真，就是说幻、美是诗艺的本身。”^{[7](67)}在沈宝基的诗学里，“神性”表现为“梦”和“幻”，指人的主观精神。“内外远近，时空今昔，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自然的具象对诗人来说，都成了心灵的风景，稍稍老庄哲学的味道和色彩。”^{[11](7)}沈宝基诗学的哲学基础为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老、庄”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认为自然与精神是统一的。诗人通过从自己的心灵中赋予自然情感和生命来表达理想和希望，体现美的价值。这在本质上恰似雨果崇尚的“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12](25)}的主客观统一的理论，又带有现实主义的色彩。“你——血肉灵智团组成的诗人/常像在说谎/而真正诗人说得谎/比真实还真”，^{[5](129)}这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宣扬的“诗歌是最高真实”的理念。沈宝基的“说谎”超越了虚无缥缈的贫乏与空洞，直指幻美的体验。他说：“我的幻美不是虚，不是空，是有积极意义的，是超现实高于现实、升华为完美的真。这幻美是神化了的、净化了的并升华了的我眼前的那个现实，这样一来，可以说我的诗歌不是一己的，也不是那种所谓逃避现实的作品，用独特的表现方式，看到人品物性的内在美，把这具有魅力的幻美归诸到我眼前的那个现实的本然，这不是回到了现实又高于现实吗？”^{[13](17-18)}

艺术理想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人的精神结构是多层次的，越是优秀的作家其精神结构的层次就越丰富与复杂。”^{[14](33)}黑格尔美学认为艺术理想与宗教理念、哲学理念一起构成完整的“绝对精神”，它的本质是“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15](201)}沈宝

基的《邀梦曲》假借“半泥半水”的宝玉在似梦非梦的太虚幻境里尽情地深吸着“充满了‘她’的空气”，自我的内在情感体验“表现为人的内心深处那些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情绪波动和千回百转、转瞬即逝的欲望”，^{[16](95)}使他日后对生命、对现实世界和人生价值有了不同于常人的独特追求。“太虚幻境里的仙子这样唱：/我的国土是无边的微笑/城市建立在大地的干枯上/它的风景有各种颜色/舞蹈的颜色絮语的颜色/它的脸散发出各种香/紫月的香/见了露珠要惊讶的心的香/常开的是我的门/青缎的步声/在你脱了叶的过去上/将酬和着/你欲情的步声。”^{[5](3)}太虚幻境里的仙子引人入梦去享受幻美，“我这爱情和快乐的仙子/我请你只听从你的‘自然’”。^{[5](4)}诗中通过各种奇妙的想象、幻想和感觉，荡涤了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加诸人的普遍观念，净化了凡夫俗念与七情六欲，使人性返回到神性的光辉之中，“绝对精神在世界中扬弃了它的认知现实性的这种有限性……自在而自为地转化为普遍性……转化为启示活动”，^{[17](319)}文学艺术就这样完成了对灵魂救赎的使命。

注释：

① 摘自沈宝基的《沉舟若干诗篇的解说及其他》，未刊稿。

参考文献：

- [1] 雨果. 雨果诗选[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2] 柳鸣九. 雨果创作评论集[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3.
- [3] 钱理群.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 [4] 唐杏英. 北京 2002 年纪念维克多·雨果诞辰二百周年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5] 沈宝基. 沈宝基诗集[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 [6] 程曾厚. 雨果评论汇编[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7] 沈宝基. 谈诗[J]. 文艺世纪, 1944(2): 65-71.
- [8] 雨果. 雨果文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9] 弗·史雷格尔. 片段[C]//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0] 雨果. 雨果抒情诗选[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 [11] 沈宝基. 沉舟[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1.
- [12] 雨果·克伦威尔·序言[C]//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3] 禹婷婷. 沈宝基与象征主义[C]. 长沙: 中南大学, 2007: 17-18.
- [14] 谭桂林. 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1): 26-39.
- [15]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6] 龙泉明, 赵小琪. 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话语[J]. 文学评论, 2003(6): 92-96.

[17] 黑格尔.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Hugo and Shen Baoji's poetry creation

LIANG Hai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Shen Baoji's "Hugo's Sad History", "The Spokesman of the Donkey", "The Poet's Human and Divine" as an individual case, expound that Shen Baoji's romantic factors in his poetry comes from Hugo's literary theory. "Hugo's Sad History" is miniature counterpart of "Pathetic World", "the Spokesman of the Donkey" has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Hugo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Poet's Human and Divin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similar to Hugo's romantic declaration.

Key Words: Hugo; Shen Baoji; poetics; romantic

[编辑: 颜关明]

(上接第 137 页)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1971 South Asian Crisis

ZHANG Wei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67, China;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1971 crisis has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South Asia. On the one hand, strategic triangle formed and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n the period of the Cold War. Its formation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sia, which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and directly affect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South Asia, so that the balance of power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sian reg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India and the US-Pakist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was strengthened;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the war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 South Asian region formed the asymmetry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For the two states, although direct confrontation about ideology, philosophy, national security was not the elimination, but India and Pakistan also recognized more clearly that through the means of war could not achieve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external and could not solve the Kashmir issue. The two countries had reflect on war, found out the means of resorting to war to take a more restrained attitude, how in the nuclear era, through the war, accessed to each other's dominant position, all can be found in India-Pakistan war in 1971, after the consideration of important strategic competition.

Key Words: 1971; South Asian Crisis; strategic triangle; Pakistan-Indian relations

[编辑: 苏慧]